

編簡年譜學術類顧

馬來西亞 鄭良樹 編著



四洲圖書公司

Chronology of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Gu Jigang

Tay Lian Soo

马来西亚 郑良树 编著

顧頤
剛學術
年譜簡編



良樹自題



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 马来西亚 郑良树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9 · 189,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45—190 书号: 17309·23 定价: 2.00元

特约编辑: 吴怀祺

责任编辑: 杨培林

装帧设计: 杨大昕



顾颉刚先生三十余岁玉照，摄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

序

——论顾颉刚之学术历程及其贡献

郑良树

在中国近代学术界里，拥有卓越成就的人物相当不少，不过，拥有非常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的，为数却不太多，而顾颉刚，就却是这少数当中的一位。顾颉刚从1920年北大毕业留校担任助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起，到1980年12月逝世为止，一共拥有了六十年的学术生命；在这不算短的六十年里，他以旺盛无比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焚膏继晷地开辟新天地，培植很多的接班人。尽管他从开始就患上无法根治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他还是坚持“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然后，业绩累累地走完他长达八十七岁的生命。

如果我们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北时，顾颉刚因为名列逮捕的黑名单内，空手辗转大后方缺乏研究资料的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如果我们了解到他痛失祖母、两度

丧妻及一度被点名批判，以至加剧他的失眠、神经衰弱症，以及后来并发出来的气管炎，而带来难以治疗的痛苦和悲伤；如果我们了解到他除了闭门治学，还因为爱国的赤忱而踏出象牙塔，考察边疆，创办杂志，组织学会，公开演讲，俨然以“书生报国”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里，那么，再回头来看看他的著作和贡献，我们才会真正地了解，他所拥有的那一股学术生命力，不但是旺盛如寒夜里扑不灭的熊熊火炬，而且是北风料峭、白雪纷飞里不肯熄灭的火炬，坚强柔韧无比。

顾颉刚在漫长的六十年的学术生命里，至少曾经在下列四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内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结了丰硕的果实：第一，古史和古籍的考辨；第二，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提倡和研究；第三，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提倡和研究；第四，古籍的译注和点校。这四个不同学术领域，一般学者只要介入任何一、二项的话，恐怕都要耗费他大半辈子的精力，然而，顾颉刚竟兼四者于一身，并且都拥有相当惊人的成就。说顾颉刚把整个学术生命同时都投入这四个学术领域，那又不尽然。他是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里，分别向不同的学术领域进军，有的领域耗费他整个学术生命，有的只几年而已。因此，只要通过这四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观察他不同学术生命的先后长短，以及如何发挥他不同的学术创造力，就可以了解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了。

以下，我们就来论述他学术生命中的几个研究领域，藉以考察他的贡献。

一 古史和古籍的考辨

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兴趣和努力，几乎充满了他整个的学术生命，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从他1921年和钱玄同讨论古史开始，一直到1979年发表《〈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及《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为止，无时不在注意古史，也无时不在研究古史，更无时不在撰述古史的论文。至于古籍的考辨，虽然占有的学术生命的长短与前者略有不同，不过，对顾颉刚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古史考辨，因此，说它占有顾颉刚的整个学术生命，似乎并不为过。

启迪顾颉刚向古史的领域迈步进军，是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他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即如此坦率地说：

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古史辨》第一册编成时，顾颉刚将胡适之先生一封四十多字的短信置于卷首，毫无疑问的，就清楚地说明胡先生的启蒙地位。《古史辨·自序》又说：

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

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论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同时，又想起本年春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辩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

胡先生《水浒传考证》发表于1920年秋天，这一年的夏天和冬天顾颉刚分别忙着编纂《中国书籍目录》和点校《古今伪书考》，所以，顾颉刚这个时候脑海里虽然已经闪烁出“古史积累的层次”的火花，却埋头忙着目录的整理和古书的点校，无暇深思，“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这一年的11月，胡先生致函顾颉刚，嘱他点校《古今伪书考》。这一工作，应该是顾颉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它只是一本分量很薄，“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书，但由于它是一部考辨古今伪书的专门著作，“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使得初学者……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顾颉刚受其影响之深，几乎是空前的，“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因此，在12月中旬写给胡先生的信里，他就建议在《辨伪三种》的《跋》里加上一个《根据了伪书而造成的历史事实》的附表。信中说：

第五表很重要。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系统,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若能仔细的同他考一考,教他们涣然消释这个观念,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这真是一大改造!

这一段话,强烈地暗示我们,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时似乎呼之欲出了。

有了胡先生的影响,再加上顾颉刚自己从《古今伪书考》得到的联想,“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顾颉刚走上古史考辨的道路,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加速及催促顾颉刚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是崔适的入室弟子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玄同来往书信讨论学问,应该是开始于1921年的春天,那个时候,钱玄同曾写一封信给顾颉刚,说:

先生所问:“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觐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

钱玄同说“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相信对顾颉刚会有警策性的作用。无奈这个时候的顾颉刚,一面忙于点校《辨伪丛刊》,一面忙着搜罗《红楼梦》的资料,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年(1922)春天,顾颉刚返乡奉侍祖母,而且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对他来说,这是摆

脱其他工作，专心致力于历史的最佳良机。既然要他编纂历史教科书，他正可利用这机会把上古史认真地整顿一下。顾颉刚这个人有一副很强烈的性格，任何一件事给他扯上之后，他一定打破沙锅追究到底，不得圆满结论不肯罢休。他发挥了这副性格，终于完成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理论；试看他如何回忆这段经过：

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尽管顾颉刚已经完成了他一生最著名的古史理论，不过，1922年往后的几个月，他忙着办理祖母的丧事，又忙着应付痛苦难挨的失眠症，根本就无心将它发表出来。

一直要到1923年的2月份，顾颉刚才将他这套理论用书信的方式，告知催促他往古史进军的钱玄同，信中说：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这封信5月6日发表于《晨报》内胡先生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九期。顾颉刚并附有《前言》，云：“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就是顾颉刚轰动学术界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

作为史学的嗜好者，顾颉刚几乎在踏入门槛之际，就

创造了一个惊动学界的学说，使他扶摇直上，登上史学专家的宝座。三年后的1926年，他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后，就到厦门大学担任国学研究院的研究教授。这个时候的顾颉刚，不过是三十三岁的年轻人而已。如果我们形容顾颉刚“少年得意”的话，恐怕不会过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发表之后，顾颉刚并没有停止学术的脚步，坐享这一次的成果，相反的，他忘记他人对他的夸奖和赞赏，不断地和反对者辩难和驳诘。顾颉刚心胸广大磊落，待人诚实恳切，不但可以接受旁人的赞赏，尤其喜爱聆听相反的意见，而且绝不以此为忤。这是顾颉刚另一个了不起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能够不断进步的另一个原因。在往后一、二年的驳诘辩难中，顾颉刚把他的学说往前再推进，往上再发展，1923年6月他答复刘掇蓼及胡堇人的辩难时，提出下列四条法则：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俟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见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决不能胡乱承认。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中国的统一始于秦，……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后，是假的。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这四条法则，与其说是推翻信史的几项标准，不如说是考订古史真伪之前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观念和心理准备。有了这些观念和准备，我们在考察古史时，才不会被书本的文字所蒙蔽欺骗。这四条法则，是顾颉刚继“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后的新发现，有了这个新发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就能解说得更圆满和合理。

往后顾颉刚在古史方面所撰述的论文，几乎都是这四条法则和“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学说的运用。如：《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三皇考》及《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等等。

顾颉刚转到中山大学后，从1927年到1929年夏天，他的古史研究几乎中断了。一直到1929年秋天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系教授后，他才又恢复了过去在古史方面的活力。第二年，他发表了惊动学术界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成为他在史学方面的第二个绝响。

在这篇文笔流畅、叙述生动长达数十万言的论文里，顾颉刚很敏锐地指出：历代的学者，包括孔子、先秦诸子、刘

歆及康有为等等，为了推行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思想，先后都曾经以当时流行的史学理论作为思想指导，纷纷地伪造古籍以便诠释历史；而西汉末年的刘歆，他为了协助王莽篡位，更是此中豪杰。顾颉刚并且指出，刘歆伪造古籍、私释历史的理论是传统的五行相生说；易而言之，刘歆就是根据传统的五行相生说，私心地伪造古籍、诠释历史。经过顾颉刚如此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可信程度不但发生动摇，中国许多宝贵的经典也立刻发生强烈的地震。顾颉刚经过几年的沉寂后，一出击就是一石两鸟：动摇了伪史，也震撼了伪经。

尽管当时一部分学者反对他的说法，例如钱宾四先生就曾写了一篇非常扎实的长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上，认为刘歆根本就不可能遍造群经。不过，顾颉刚并不因此而停止他学术上的脚步。1933年他完成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易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及后来完成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都是这套理论的运用和挥。

顾颉刚创造了这两套学说，已经将他的古史研究推至巅峰境界。第二次大战之前，他在古史研究方面暂时圈上一个句号，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去。抗战期间，大后方藏书不多，他顶多也只是完成一部《浪口村随笔》，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抗战胜利后，他忙着清理家务，安顿生活，在1949年来临之前，他在古史研究的领域里几乎交了白卷。往后的几年，他几乎失去了过去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一直要到六十八岁的1961年，他才重新走向古史研究的路上去。从抗战胜利到这一年，顾颉刚这一去就

是十七年，对古史研究乃至顾颉刚本人来说，无宁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1961年，顾颉刚开始撰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这是一篇很长的巨构，一共消耗他六年多的时间，还没法子完全杀青。在这期间，他又带病撰述《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也没法完成。自此以后，顾颉刚在这个学术领域里就宣告封笔收山，1979年在《中国哲学》第二辑发表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应该是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生命的最后一个句点。

顾颉刚是以古史研究而名噪学林，综观他整个学术生命，可谓名实相副。抗战之前，是他研究古史的黄金时代，精力之旺盛，想象之繁富，创获之丰硕，使他年满三十三即登上研究教授之宝座。卢沟桥事变之后，一直到他谢世为止，整整五十五年的时间，他在这个领域里顶多勉强地维持一个格局而已，和往昔的学术成就实在不能相配。以他对古史的酷爱和耽溺，加上他旺盛的精力，他往后近乎三分之二的学术生命的成就，实在不应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号，而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感叹号。

二 古代地理和边疆的研究

顾颉刚和地理学结上因缘，开展他的第二学术生命，应该是在1931年。那一年的元月，他撰成《研究地方志的计划》，发表于《社会问题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就已经开始介

入这个新的领域。第二年秋天，他在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一课，主讲《禹贡》，这就正式涉足这个领域，他说：

顾颉刚七年以来，在各大学任“中国上古史”课，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是地理方面，原为研究历史者迫切的需要，但不幸最没有办法。……因此我就在燕京和北大两校中改任“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功课，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预计这几年中，只作食桑的蚕，努力搜集材料，随时提出问题；希望过几年后，可以吐出丝来，成就一部比较可靠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讲义”……

可见顾颉刚涉足古代地理，在开始的阶段，也不过是为了克服研究上古史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然而，不久之后，顾颉刚不只是“玩票”“客串”而已，他甚至于把全部精力投入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里去。1933年他发表《两汉州制考》、《州与岳的演变》以及和郑德坤联名发表的《研究经济地理计划刍议》，似乎是他在这方面的第一大步。1934年元旦，他发表个人全年读书计划，说：

如果我有非常的幸运，民国二十三年可以让我安心治学，……我希望能在这一个范围里做成下列各事：第一，《禹贡》方面，能把胡渭的《禹贡锥指》细读一遍，并随时绘图。再下一年，我便搜集《锥指》以外的材料，编辑《禹贡问题集》……。第二，《职方》方面，在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之外再集材料，准备在编《禹贡问题集》的时候，联带把《职方》中的问题解决。第三，《汉书·地理志》方面，能把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中的《地